

戰火燃燒下的青春歲月 (四)

非左即右的思想立場左右著內外政策，容不得模糊的中間立場，香港也出現工潮和左派抗爭，中方就終止和舅父的船務租賃合約，至使船務公司轉向私人全部運作，舅父只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的商人而不是一個革命者，如果當時中方決策人能夠較客觀的看待他的環境，讓他處於中間立場狀態應該是較適宜的。自從自己經營以後，在管理和用人方面出現許多漏洞，他仍以過去那一套在柬運作方式憑著意氣，和朝令夕改、任意插手的方式指揮業務，周圍的幹部好友都無法說服改變其不良作風。這些都是致命之傷，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舅父因中國因素和性格之優點而成功，

也因中國因素和其性格之弱點而失敗。每當人們談起他在柬成功和在香港失敗的故事總覺得不可思議，為他的成功而敬佩，為他的失敗而惋惜。像人生大起大落的例子並不常見，也許一個人的某些優點長處在某種環境下是成功因素，但在另外環境中這些優點卻是他致命點。香港是一個世界大都會，藏龍臥虎，經營環境和事業與柬埔寨大不同，舅父到港已成名人，不用主動交際，各方人物都來登門拜訪；真誠合作的，求助的，討好歡心獻媚的，設陷阱的都有，沒有清醒的頭腦很容易分不清，所以舅父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將柬之作風套在香港之事業上和他性格弱點導至的。

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後，舅父覺察到商機，先後到廣州東方賓館，北京的北京飯店設辦事處，並由一位北京年輕人作助手協助工作，由於中國剛開放，與外面的聯繫甚少，許多國內政府部門，企業都跑到他辦事處求助，招商立項，他的辦公室就像小交易會一樣，來往之客絡繹不絕，而舅父又善於交際，很多重要人物都同他有來往包括毛澤東戰友何長工，還有烏蘭夫，和軍隊的總參謀長楊德志上將等，他後來還擔保何長工女兒到倫敦學習居留。他還告誡我同中國做生意要具備三個心：愛國心，耐心和信心，他就是以這樣的心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80年代初，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居留期間，舅父和同鄉好友黃松先生到東交民巷官邸拜見親王，親王相當高興激動，他指著舅父說：當年是你同朗諾把我推翻下臺的，並同舅父，黃松合影留念。其實他們早已相識，當年舅父獲准從香港返柬就在桑園官邸接受勳爵封號，後來王子在同澳洲名記者貝切迪談話著書“我與美國中央情報

局的戰爭”中談到舅父，稱“朗諾的買辦郭安”。

柬埔寨歷史研究者透露當初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聯繫上親王的表兄西梳窟。施裡瑪達和總理隆波烈，他們是主謀，而當隆將聯繫之事稟告朗諾，朗諾沒表示什麼態度，只是說繼續保持聯繫。政變的最大藉口是反對王子允許越南南方解陣數萬軍隊駐紮在柬埔寨邊境境內。政變醞釀之初，施、隆他們想使手段謀殺西哈努克而朗諾不同意方案而作罷。政治就是錯綜複雜，更何況事關政權更疊，一旦牽涉進去，就無法說清了，舅父也難例外。一些歷史學家曾分析說，這場政變是造成高棉民族分裂而引發內戰的原因之一，它把這個小國家折騰了將近三十年。舅父，黃松同王子交談甚歡並答應盡力支持王子的救國鬥爭，當時正洽談同法國Total石油公司在南海勘探開採石油項目作為支持項目之一。黃松後來在王子歸國後也向國王服務隊捐贈了十幾輛東風牌的卡車，他們倆人在北京期間也同親王大女兒帕花黛薇公主，駙馬 KHET Vandy 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984年舅父率同解放軍後勤所屬的“新興集團”領導到非洲喀麥隆考察開發森林就住在公主位於巴黎 16 區鐵塔附近的“Raymond Pointcare”大道所開的酒店，項目是同駙馬合作，正好我去會見舅父時也認識公主駙馬。在事業受挫之後，他一直在努力試圖東山再起。

舅父是一個重感情的人，在朗諾倒臺到夏威夷落難時，他也頂住政治上的壓力去過探望郎諾。赤棉掌握政權以後，許多親友逃難到越南，泰國，舅父十分關心他們的安危，即使自己難以自保仍傾能力幫助他們，從越南把陳世敏夫婦，四姨媽一家及姨丈妹妹一家共十幾人擔保到倫敦居留生活至今，在北京飯店的日子裡，通過邱及先生，舅父將柬埔寨朗諾政變的前後經歷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寫成資料呈送有關部門存檔。

由於他不注重身體健康，1986年被診斷為肝癌於同年8月在倫敦病逝，享年56歲，可謂英年早逝。我在他逝世前的一個星期同表哥到他倫敦住處探望他，那時他已從醫院搬出臥病在床，一面同我們談話一面打長途交代相關人仕作他事業上的安排，